

方国瑜 林超民 著

马可波罗行纪与云南史地丛考



民族出版社

《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

方国瑜 林超民 著

民族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4 号

封面题字:刘乃和

责任编辑:马淑贞

封面设计:胡宝利

《马可波罗行纪》云南史地丛考

方国瑜 林超民

*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民族出版社微机照排

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4 5/8 字数:113 千字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000 册 定价:2.50 元

ISBN 7—105—02067—9/K·197

(汉 105)



方国瑜先生与林超民合影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马可·波罗到云南、缅甸的时间	(11)
第二章 云南行省的政区	(16)
建都	(19)
押赤	(22)
哈刺章	(25)
金齿州	(27)
茶罕章	(31)
赤秃哥儿	(37)
广南西路	(39)
第三章 阿緬与班加刺	(42)
阿緬	(42)
班加刺	(45)
第四章 马可·波罗云南之行的路线	(49)
元代的“站赤”	(49)
从成都到建都	(55)
从建都到押赤	(60)
从押赤到哈刺章	(65)
从哈刺章到永昌	(70)
自金齿边界入緬到蒲甘	(73)
由班加刺经景谷(交趾国)到阿憐	(89)

从阿剌到秃刺蛮·····	(103)
经叙州返回成都·····	(110)
第五章 马可·波罗西南之行的沿途记事 ·····	(113)
元朝征缅·····	(113)
经济与货币·····	(121)
对外贸易·····	(128)
宗教·····	(130)
蟒蛇与大象·····	(135)
风俗习惯·····	(139)
后 记·····	(143)

7296/9

前 言

马可·波罗(Marco Polo,约1254——1324年),一译马哥·李罗,中世纪意大利的杰出旅行家,是当时沟通西方与东方信息的重要人物,他留下的《马可波罗行纪》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眼界,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

马可·波罗出生于意大利“水城”威尼斯(Venice)。马可·波罗的父亲马可·尼古刺(Marco Nicolas),叔父马可·玛窦(Marco Matteo)都是威尼斯的巨商。1271年,十七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马可·尼古刺、叔父马可·玛窦离开威尼斯去元朝。他们先去阿克(Acre)城向专使取得证书,又到耶路撒冷(Jerusalem)讨得圣油,再往前行,行至拉雅思城,得知教皇专使已被选为教皇,是为格里戈利十世(Gregory the Tenth)。新教皇立即派人召他们回去商议。格里戈利十世选派牧师威廉和尼古拉斯随他们去见元世祖忽必烈。一行五人来到拉雅思,正遇巴比伦苏丹邦多克达里率领阿拉伯大军来侵亚美尼亚,因道路不清,商旅裹足,两位牧师大为惊恐,不敢前行,将一切证书、公文、礼品交马可·波罗三人,原道返回。马可·波罗同父亲、叔父经过长途跋涉,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于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达元朝的上都,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欢迎。马可·波罗三人详述往返经历,呈上教皇书信、圣陵灯油和各种礼品,元世祖大加赞赏,并将马可·波罗列入了荣誉侍从的名册中。

据《马可波罗行纪》说:马可·波罗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东方的风俗、礼仪,并且懂得四种语言文字,忽必烈很赏识他,派他出使国内外许多地方,并且在扬州做了官。他曾到过中国的西南以

至缅甸，游览了江南及苏、杭等名城，又曾奉使去过东南亚一些国家。在《行纪》中对波斯、中亚各国、蒙古诸汗国记述尤为详尽，因为他来中国，返回欧洲都是经过这一地区。

马可·波罗一家三人在中国住了十七年，虽然受到元朝的优宠款待，但他们仍时时想着返回故乡。事有凑巧，这时伊利可汗阿鲁浑(Argon)的妃子死了，派使臣到元廷，请求赐婚。忽必烈命以阔阔真公主下嫁阿鲁浑。马可三人即利用这个机会，争当向导，要求陪伴阔阔真公主一行前往波斯。

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初，马可·波罗一家三人随同护送阔阔真公主的使团，趁冬季信风从泉州出洋，经过苏门答腊、锡兰、马拉巴海岸，由忽鲁谟斯登陆以至波斯。当他们到波斯时，阿鲁浑汗已去世，只好将阔阔真公主交给阿鲁浑的儿子合赞(Kasan)完成了使命。马可·波罗和父亲、叔父经特烈比宗德(Trebizond)再转君士坦丁堡，途经奈格勒朋(Negvopont)回到故乡威尼斯城。回到家乡已是1295年了。

马可·波罗回家住了四年，适逢威尼斯和热那亚(Genoa)作战，马可·波罗志愿参战，不幸战败被俘，在热那亚的监狱里关了四年。他对同狱的难友口述在亚洲游历的往事，由一名叫鲁思梯谦(Rustliciano)的比萨(Pisa)人笔录下来，这就是《马可波罗行纪》的最初稿本。马可·波罗被释放后回到威尼斯，于1324年逝世。

自鲁思梯谦把马可·波罗的口述笔录下来整理成书以后，《马可波罗行纪》(简称《行纪》——编者)的抄本迅速流传，风行一时。1477年德文译本出版，这是本书的第一个印本。现在《马可波罗行纪》流行甚广，几乎各国文字皆有译本，其版本有一百种左右。《马可波罗行纪》最原始的稿子用何种文字记述，论说不一。赖麦锡(G. B. Ramusio)未加考证即断定最先是用拉丁文。马斯顿(Marsden)揣测为威尼斯土语。巴尔德利博尼(Baldelli Boni)经详细考证，辨其最先文字为法文。亨利·玉尔(H. Yule)考证阐明其说，认

为是法国古代土语。以后学者F认为可信,多从其说。

《马可波罗行纪》的版本相当多。张星烺译注的《〈马哥孛罗游记〉导言》第九章、第十章详细介绍了《马哥孛罗游记》流行的主要版本。归纳起来有:法国地理学会版,又名老法文版;改定的五种法文写本;庇庇诺(Pipino)拉丁文译文;赖麦锡意大利文版;“Z写本”(Codex Z)。由于近代许多国家加强了对此书的研究,故出现了不少善本。英文有亨利·玉尔、考狄(Cordier)本,校勘译注,颇为精审。1928年拜内戴拖(L. F. Beneditlo)意大利文新本《马哥孛罗游记》刊行,增加了不少译文。1938年,缪尔(A. G. Moue)与伯希和(P. Pelliot)的《马可波罗寰宇志》(《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合订本在伦敦出版。这个版本是中外研究《马可波罗行纪》的学者所公认的较好的本子。伯希和遗著《〈马可波罗游记〉诠释》共三卷,前二卷就《游记》中的有关人名、地名、植物名等进行考释,计有三百八十六条,第三卷为详细的索引。全书一一九〇页,约百余万字,分别于1959、1963、1973年由法国国家出版社出版。^①

我国介绍《马可波罗游记》似始于1874年。北京同文馆出版的《中西闻见录》第二十一号,有映堂居士写的《元代西人入中国述》,首先介绍了马可·波罗的事迹。洪钧著《元史译文证补》也引用了《游记》。清末魏易翻译了《马可波罗游记》,逐日登载于汪康年所办的《京报》上,1913年7月将全书译出,由正蒙印书局出版,书名是《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梁启超为之题封。1924年张星烺翻译兼注的《〈马哥孛罗游记〉导言》,陈垣题封,柳翼谋作序,以受书堂丛书第一种,由中华印刷局印刷,中国地学会发行。1936年4月,李季据曼纽尔·科姆诺夫(Manuel Komnoff)编定的英文本翻译《马可波罗游记》,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1936年11月,商

^① 江辛眉:《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诠释〉简介》,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2期。

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冯承钧翻译、沙海昂注刊本《马可波罗行纪》。1937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张星烺据拜内戴拖刊本翻译的《马可波罗游记》，收入万有文库第二集。解放后，中华书局重印过冯承钧译、沙海昂注的本子。1981年12月，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开俊等四人翻译的《马可波罗游记》，所根据的版本与李季1936年所译的《游记》同为曼纽尔·科姆诺夫的英译本。^①据报道，商务印书馆已请上海东方语言学专家龔方震及其学生翁经方译伯希和遗著《〈马可波罗游记〉诠释》。^②

关于马可·波罗本人及其《行纪》，过去已作过不少研究，近几十年来发表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学术论文，解决了一些重要的问题。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读柯立福教授的〈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汉文资料及其到达波斯的波斯文资料〉》^③、《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几个问题》^④以及张跃铭《〈马可波罗游记〉在中国的翻译与研究》^⑤。1983年12月，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余士雄主编的《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选辑了我国报刊上自1874年发表第一篇介绍马可·波罗的文章至今一百多年来，有关马可·波罗及其《行纪》的重要论文和评介文章。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马可·波罗是否就是《元史》所说的枢密使孛罗？1865年，法国人颇节(G. Pouthier)以为马可·波罗就是至元十四年(1277年)二月任命为枢密副使的孛罗，^⑥也就是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阿合马(Ahmad)被杀后奉命讨乱的枢密使孛罗。^⑦颇节所刊行的《马可波罗游记》汉文题名为《忽必烈枢密副使博罗本书》，其用“博罗”二字是因为清乾隆时代，曾把《元史》中的

① 详见余士雄：《谈新译〈马可波罗游记〉》，载《读书》1982年第10期。

② 见《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

③ 见《南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④ 见《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

⑤ 见《江淮论坛》1981年第3期。

⑥ 见《元史·世祖本纪》卷9，第188页。

⑦ 见《元史·阿合马传》卷205。

“孛罗”改为“博罗”。其后欧洲学者如亨利·玉尔、沙海昂等多从其说。我国的魏易、李季亦沿其误，张星烺则集其大成，在《〈马可孛罗游记〉导言》中增补了《中国史书上之马可孛罗》一节。因之，他将马可·波罗的汉文译名写作“马可孛罗”，以同《元史》上的“孛罗”一致。1923年11月，束世澄在《史地学报》第2卷第7期上发表《中国史书上之马可孛罗考》时，对“枢密副使即为意大利大旅行家”提出质疑。继后，法人伯希和以及我国学者冯承钧、岑仲勉，亦加深入辩证驳斥。此一问题已被彻底否定。^①冯承钧在他翻译的《马可波罗行纪》的“序”中写道：“沙海昂沿袭颇节的错误，仍以马可·波罗是元代枢密副使孛罗，致使华译本有孛罗为本书标题者。伯希和对此辩之甚详。我以为不用多说，仅据《元史·世祖本纪》之文，已足证明此种考证之伪。……所以我名其人曰：马可·波罗，而不名之曰：马可·孛罗。”

《马可波罗行纪》各种文字的版本无疑百十种，而各有长短，沙海昂采众本校释而为之注，虽然伯希和对此书颇多指摘，但他将颇节本草新，又能辑诸注释家众说之长，可算是较为完善的本子。而冯承钧的译本又“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在现有的汉文译本中，算是较好的一种。沙海昂在其注释本的“叙言”中引烈缪萨(Abel Remusat)的话说：“校勘一部马可·波罗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业。要作这种事业，必须确知中世纪的地理、东方的历史，此时代旅行家的行纪，当时同现在鞑靼人、印度人同其他亚细亚民族使用的语言，以及他们的风俗，同世人不大认识的出产。既确知矣，尚须加以适当的批评，细密的鉴别。这些事业无论一个人学识如何博洽，用力如何勤挚，很难兼而有之。”前此西方学者致力于此书的研究、注释等，虽多已得确解，亦难免不实不尽之处，犹待加以补正。我国现

^① 详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下册附录：伯希和著《〈马可波罗行纪〉沙海昂译注正误》；冯承钧：《马可波罗行纪》“序”；岑仲勉：《蒙古史札记》(八)《枢密副使孛罗》，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5年第5本第4分册。

只有四、五种译本，至于考证之作更是稀少，需要我们在中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把马可·波罗及其《行纪》的研究向前推进。

《马可波罗行纪》第十五章《大汗遣马可出使》说：“命他奉使至一程途距离有六个月之地。”陈开俊等四人合译的英译本第四章说：“特派他到离京都六个月路程的地方，名叫哈刺章(Karazan)的城市，处理一件重要的国务。”所说即马可·波罗的中国西南之行。他自大都出游，经太原、关中、成都、土番入云南，历罗罗斯、鄯阐、大理、金齿至缅甸，复自缅甸白古入云南元江路、临安路，又从乌蒙道出四川，由叙府返回成都，沿原路回到大都。《行纪》第十六章《马可之出使归来》说：“马可奉使归来，谒见大汗，详细报告其奉使之事。言其如何处理一切，复次详述其奉使中之见闻。大汗及其左右闻之咸惊异不已。”马可·波罗沿途留心考察，注意搜集和采访风俗民情，奇闻轶事，所以能详细地向大汗报告其奉使中的见闻。他这样留心观察，注意采访，是“因为他从前屡见使臣出使世界各地，归时仅知报告其奉使之事。大汗常责他们说：‘我很喜欢知道各地的人情风俗，乃汝辈皆一无所知。’大汗既喜闻异事，所以马可在往来途中注意各地之事，以便好向大汗言之。”①

马可·波罗的中国西南之行，是为“处理一件重要国务”，并非寻常的旅行。他在《行纪》中对云南、缅甸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地理交通都有详细的记录，是我们研究元代西南地区历史的极重要的资料，应当认真研究。方国瑜曾作《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笺证》，发表于《西南边疆》1939年第4期，对当时云南的一些地名及其他问题做了考证，然未完备，今在《马可波罗〈云南行纪〉笺证》的基础上，对《马可波罗行纪》中涉及的云南行省和缅甸的政区、马可·波罗在这一地区旅行的具体路线、元朝征缅、社会经济、宗教习俗等作一粗浅的探索考订，分类纂录，以补马可·波罗研究中的不

① 见冯承钧译、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第十五章，商务印书馆1936年11月。

足,给感兴趣的国内外人士提供一点线索或资料,向专家和读者求教,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教正。

我们手头只有1937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星烺翻译的《马可·波罗游记》四册;1936年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冯承钧译、沙海昂注的《马可波罗行纪》三册;1981年12月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开俊等合译本《马可波罗游记》全一册。我们的考试以冯承钧本译本为依据,参照其他两本的异同。

另外,有必要就马可·波罗是否到过中国,是否到过云南、缅甸诸地的问题说几句。马可·波罗的《行纪》一书所叙,为当时东方各国的奇闻轶事,在缺乏东方常识的欧洲人看来,《行纪》所叙述的地理、方物、史事,简直像天方夜谭一类的神话,虽然使他们震惊激动,却又怀疑它的真实性。中古时代,马可·波罗在欧洲有极大的影响,然而一般人又把他当作吹牛大王,甚至说他是“骗子”。

十五、十六世纪后,东、西方的交通逐渐发展,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欧洲对东方的社会历史、山川地理、风俗人情的知识也逐渐丰富起来了。十九世纪中叶,欧洲一些学者利用东方文献,证明马可·波罗的《行纪》所记录的东方情况基本上是正确的。本世纪中、外许多学者经过对《马可波罗行纪》一书做了认真探索与深入考究后,大都认为马可·波罗的确到过中国,并游历了中国的西南、江南等地,其足迹遍中国。

1982年4月14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克雷格·克鲁纳斯的《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没有?》的文章。这篇文章说:马可·波罗的书,“当然有可以相信和有价值的材料,但是它们不一定是个人亲自目睹的材料。”“他可能根本就没有访问过中国。”“有可能,有些现在已经失传的导游手册的内容,加上道听途说,便成了他游记的基础。”对此,杨志政教授在《环球》杂志1982年第10期发表《马可·波罗与中国——对〈马可·波罗到过中国没有?〉一文的看法》,以确凿有力的证据,简要地论证了马可·波罗到中国的真实

性。关于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中国的历史书和《马可波罗行纪》的记录,都有明确无误的证据,也为中、外广大研究马可·波罗及其《行纪》的学者所承认。有的研究者,如美国学者海格尔先生,虽然认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但只到过北京(元代的汗八里,即大都)他关于中国其他各地的记载,都是从北京来的。^①关于这个问题,杨志玖教授撰写《马可·波罗足迹遍中国——与海格尔先生商榷》一文,详加论证,说明“根据马可书中提供的线索和中国的资料,马可·波罗最少有三次从北京出发,奉使到中国的西南高原和东南海疆,而不是长期盘旋于北京和开平府之间。马可书中关于中国中部和南方的记载,当是以这几次游历为主要基础(不排斥还有他私人的出行)而完成的。”^②这个意见是正确的。我们对《马可波罗行纪》中的中国西南之行详加考证,无论从《行纪》本身的记录,还是中国的有关资料,都有力地证明马可·波罗不仅确实到过中国,而且奉命亲自出游了中国西南与缅甸。他所叙述的旅行路线和沿途所见的风土人情、社会经济、战争情况等大都是真实可信的,有些还是迄今所能见到的最初的文字记录。例如,马可·波罗从建都(今四川西昌)到押赤(今云南昆明)的路线为:从会无(今四川会理)渡不鲁郁思河(金沙江)经今元谋,武定地区开发较晚,故成为通行大道在宋末、元初,而最先见于记录即为《马可波罗行记》,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是不可能有此记述的。又如,马可·波罗沿途所走的路线与日程虽小有谬误,但整个看来与汉文记录的资料大体相符。马可·波罗所记云南的社会经济与风土人情,既生动具体,又真实可信。如云南使用贝、盐作货币,黄金在不同地区的比价等记录都是可靠的,也并非是无稽之谈能得到的知识。又如云南的宗教,乍看起来,所过之地就居民都是“偶像教徒”而言,似乎是“公式

① 见 John W. Haeger:《Marco Polo in China? Problems With internal Evidence》,载《Bulletin of Sinology and Yuan Studies》1974 年第 14 期,第 22—30 页。

② 见《南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 6 期。

化的老一套叙述”，但细细考究，他所说的都符合事实。如说押赤有聂斯脱里派教徒，从汉文记录知当时聂斯脱里派教徒马薛里吉斯就随赛典赤到云南传过教。又如说云南大多数地区的居民是“偶像教徒”，而说金齿州“其人无偶像，亦无庙宇，惟崇拜其族之元祖”。考之中国史籍，这一地区明初钱古训、李思聪出使此，仍无佛教，则马可·波罗并非凭空地、“公式化”地叙述，而是亲历其地的真实记录。又像云南居民“食生”的风俗，秃刺蛮悬棺葬的习惯，傣族以金饰齿的特点等，都写得具体逼真。这样的记述可说充满马可·波罗书的《云南行纪》中，不暇枚举。充分说明马可·波罗既不是凭某种“导游手册”，也不是在北京道听途说而写出这部震惊欧洲的《行纪》的。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和直接观察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游记的！马可·波罗关于云南的记述的确像他说的那样：“我还没有告诉你们我所看到的事实的一半哩”。

我们对马可·波罗的中国西南及缅甸之行做一些粗浅的考究，一方面是给研究者和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线索和资料，另一方面也是用大量的事实来证明马可·波罗不仅确实到过中国，而且确实到过云南、缅甸，以参加目前国际上关于马可·波罗问题的讨论。现在由意大利、中国和美国合拍的电影片《马可·波罗》已在外国放映并引起轰动。但是这部大型的影片却没有马可·波罗到中国西南及缅甸的这段艰险而又富于风趣的旅程，这不能不说不是一个缺憾。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能对国内、国外的马可·波罗研究工作起到一点作用，使人们能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去领略元代云南的社会生活与风土人情。

《马可波罗行纪》在古代地理学史上，在亚洲历史的研究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在云南的历史研究上也有无可怀疑的重大价值。因而深入研究《马可波罗行纪》既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限于知识和能力，我们仅对马可·波罗的云南、缅甸之行做一些疏证考究，其间定有不少错误与讹误，恳希得到各

方面的批评教正。

马可·波罗是把古代欧洲与东方联系起来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眼界，向他们展现了古代东方的灿烂文化与高度文明。他在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上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今天，我们对《马可波罗行纪》的研究，也必将对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促进作用。

第一章 马可·波罗到云南、缅甸的时间

马可·波罗居留中国的年代,《行纪》所记年代不确。过去,中外学者推断马可·波罗离华的时间在1292年初。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根据《永乐大典·站赤》的一段记事,发现《站赤》这段材料所记三位使者的名字,和《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记伊利汗阿鲁浑派遣到中国来的三位使臣的名字完全一致,证实了马可·波罗确实到过中国;同时根据这段材料提供的年代,断定马可·波罗离开中国的年代是在1291年初,也就是至元二十八年年初。^①伯希和则根据哈模和多桑关于合赞汗的记事,推断马可·波罗离华的时间应在1291年,与杨志玖的考订不谋而合。^②杨志玖所考定的年代当可确信。又《行纪》第十六章说:“马可·波罗仕于大汗所垂十七年,常奉使往来于各地”,则可确定马可·波罗来华时间为至元十二年(1275年)。

马可·波罗在中国十七年间,曾奉忽必烈之命,多次出使国内外许多地方。其中出使云南(哈刺章)与缅甸是一次重要的游历。《行纪》较详细地叙述了这次游历的途程与见闻,惟具体年代不详。张星烺译注的《〈马哥孛罗游记〉导言》第二十节《马哥孛罗蒙忽必烈大汗之擢用及其出使纪程》说:“马哥最初次之出使,乃向西南行,道经山西、陕西、四川及西藏东部蛮荒之境而至云南,蒙古人当时称其地曰哈刺章。”张星烺《注》说:“西南行程,为马哥初次使命。赖麦锡之本谓之若是,或为编辑者臆想之词,然吾可断定其为

^① 见《文史杂志》1941年第1卷,第12期。

^② 见杨志玖:《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载《南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